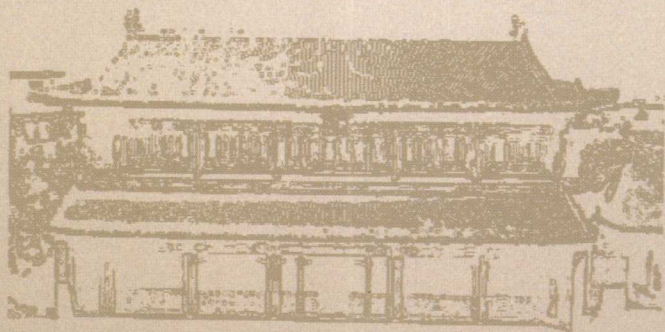


清代史馆 与清代政治

王记录 著

清代是中国史馆制度发展的顶峰。清代史馆修史与幕府修史、私家修史三者之间既相互争斗又相互补益，共同描绘了清代史学绚烂多姿的图画。史馆修史与清廷政治斗争、帝王文治、民族问题、边疆问题等关系密切。清廷利用政治权力设立史馆来控制官方史学，通过官方史学来配合政治决策，使历史学在清代政治运作、文化发展、文治兴盛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史馆修史还与宋学、汉学以及西学纠葛在一起，相互影响，既有融合，又有矛盾。书中凝结了作者研究上述问题的有开拓性的见解。



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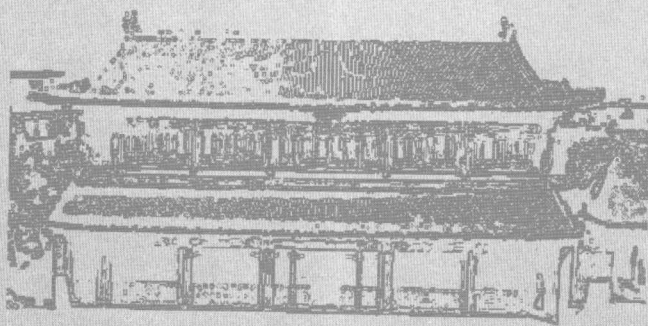
QINGDAI SHIGUAN YU QINGDAI ZHENGZHI





QINGDAI SHIGUAN YU QINGDAI ZHENGZHI

清代史馆 与清代政治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王记录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
ISBN 978-7-01-007621-8

I. 清… II. 王…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清代②政治-研究-中国-清代
IV. K249.07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1884 号

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

QINGDAI SHIGUAN YU QINGDAI ZHENGZHI

王记录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33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7621-8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周少川

陈垣先生主张，学术论著在写成之后，要“多置时日”，不必急于发表。这是为了留待时间的考验，既可回头审视，完善已有的学术观点，又可不断补充新的材料。王记录教授的《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一书，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三年多的沉淀和修订，终于要付梓出版了，我作为他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指导教师，在由衷祝贺的同时，也分享着这份收获的快乐。

清代的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经过两千多年的演进，思想与文献的积累，到此时，古代史学业已积淀厚重，内容丰富。于是，清代史学在前代史学成就的基础上，推波助澜，演绎出集大成的宏伟气象。其官方史学秉承满族统治者入关后崇儒重道、振兴文教的文化政策，在顺治皇帝“凡一代之兴，必垂一代之史”思想的指导下^①，积极进行史馆建设，建构特开、常开、例开及阅时而开等各种类型的史馆，编纂了209部22788卷史籍^②。清代的私家史学更是名家辈出，清前期与后期重大的社会变动，激发了史家历史批判精神和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涌现出了前期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中期的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章学诚，后期的龚自珍、魏源、黄遵宪乃至梁启超等大家，他们熠熠生辉的思想与博大精深的著作，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走向高峰，孕育了近代史学的发展。有的学者称魏晋南北朝、两宋之后，“清代的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三次高潮”^③。我以为清代史学又要比以往更为发达，以前有些学者为清代其他学术的繁荣所蔽，未能看到清代史学的地位，甚至有贬低清代史学的倾向，这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记录君历来重视对清代史学的研究，他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便已撰有《中

① 《清世祖实录》卷42，顺治六年正月丁卯，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详见本书所附《清代史馆所修史籍表》，这只是一个很保守的统计数目。

③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4、351页。

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一书，对清代丰富的史学思想做出精辟独到的分析。入学后，他对学位论文的选题是颇费一些功夫的，几经遴选，最终还是将目光聚焦在清代史学上。把研究对象确定为清代史馆，主要出自两方面的思考。一是由于清代史学的重要地位，并照顾到记录君已有对清代史学研究的基础和积累。二是考虑到他以往对清代史学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于私家史学，关注于史家史学思想的阐发；对于记录君来说，只有进一步地爬梳、研究清代官方史学的成就，庶几可言对于清代史学的面貌有全面的把握。系统考察清代史馆的建构、修史制度、编纂成果及相关问题，自然是研究清代官方史学的最佳途径。20世纪以来关于清代史馆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的成就，然个案的、部分的研究为多，全面系统考察清代史馆的论著仍未得见，留下了较大的研究空间。

清代史馆的建置规模与修史成就，超越了历代史馆，从学术含量来讲，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学术开采价值的研究对象。然而，关于选题的论证并未就此止步，思考还在继续。我们在讨论中意识到，仅对史馆建置、制度的研究，容易流于程式和琐碎，以往某些关于史馆研究的论著已有这方面的教训。钱穆先生说：“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①只有将清代史馆研究置于清代社会政治的架构中作整体探究，方具有深度的理论意义，方能把握清代史馆修史制度下清代官方史学的本质。于是，“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研究的选题终于浮出水面了。

“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的研究是个大题目，如果是别的研究生，我恐怕不敢贸然同意作此大题。然而以记录君的学术积累和能力，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我认为他有把握完成这样一个大题大作的任务。事实证明，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选题，在学位论文答辩会上，与会专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一书，以清代史馆研究为枢纽，对有清一代史馆修史的发展、成就及其与诸方面之联系，尤其是与一代政治风云相起伏、相影响的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和考察，视野开阔，剖析深刻，将清代史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全书的学术创新价值，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值得称道的。一是首次系统阐明了清代史馆的机制及运作方式，书中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对一些重要史馆的设立过程，史馆与内阁、翰林院的关系，史馆的管理制度、史料的征集途径等问题做出详细分析，总结了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二是深入考察了史馆中史官的活

^①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页。

动与官僚体制的关系，并对史馆修史、幕府修史与私家修史三种不同修史形式的关系进行讨论，说明它们之间既存在矛盾又互相补益的事实。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清代史学整体的、动态的发展。三是探讨了清代史馆与政治的互动。白寿彝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①。本书正是在这一精神指导下，通过具体的史料和事例，深刻揭示了史馆修史与清廷政治斗争、帝王文治、民族问题、边疆问题的关系，展示了专制政治下官方史学的政治化特征。

将史馆修史置于清代政治、学术、文化的历史总相中进行分析；由具体的史实上升到抽象的理论高度，思考史馆修史与政治运作、史学的学术化与政治化等问题，从而得出具有普遍理论意义的认识，这是本书最为突出的特点，也充分体现了记录君扎实雄厚的学术功力和理论素养。本书结语中高屋建瓴的理论归纳，以及书中具体的钩稽阐释，便留待读者品评，不须在此赘述了。

我与记录君相识十几年。他尊我为师，我视他为友，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在博士研究生的三年期间，一边要学习，一边还负责着工作单位的一些教学、行政任务，其艰辛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却以加倍的勤奋，圆满完成了学业。他的刻苦精神和优良学风，不仅为本专业点的研究生作出表率，对我也是极好的鞭策和鼓舞。韩愈《师说》曰：“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诚哉斯言。《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一书是记录君学术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由此而引发的学术思考和后续研究仍在进行。据我所知，本书的副产品《〈清实录〉史馆修史资料编年》一书已在修订中，很快亦将面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记录君会在清代史学和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取得更为丰硕的成就。

岁末年初，杂事纷扰，恕不能一一表阐精要。略作条陈，聊以为序。

戊子年末于北京师大励耘九号楼

^① 引自龚书铎《政治是历史的脊梁》，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编《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目 录

序	周少川 (1)
绪 论	(1)
一、史馆释义	(1)
二、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及意义	(5)
三、清代史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8)
四、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方法及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14)
第一章 清代政治的演变与史馆的建置	(18)
一、入关前的制度建设与官方修史的状况	(18)
二、顺康时期：清初文化政策的确立与史馆格局的基本形成	(23)
三、雍乾时期：清廷政治导向与史馆制度的完善	(30)
四、嘉庆至清亡：清代政局的变化与史馆修史的逐步衰落	(34)
第二章 清代史馆的机制和运作（上）	(40)
一、清代史馆的类型及其关系	(41)
二、清代史馆与内阁、翰林院的关系	(67)
第三章 清代史馆的机制和运作（下）	(78)
一、清代史馆的管理机制	(78)
二、清代史馆的史料征集	(94)
三、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	(106)
四、清代史馆修史的成就	(120)
第四章 清代史馆与史官	(125)
一、史官的流动性	(125)
二、史官的学术争论、相互影响和思想冲突	(133)
三、史官在史馆之外的撰著活动	(142)

四、史官的学术修养、政治情怀和多重人格	(149)
第五章 政治制约与史馆、幕府和私家修史	(158)
一、三类修史形式的研究对象和思想倾向	(159)
二、三类修史形式之间的联系	(167)
三、三类修史形式在清代史学演变中的消长	(176)
第六章 清代史馆与清代社会政治的关系	(187)
一、史馆修史与清廷政治斗争	(187)
二、史馆修史与清代帝王文治	(201)
三、史馆修史与清代民族问题	(213)
四、史馆修史与清代边疆问题	(225)
第七章 清代史馆与政治变动下的清代学术文化	(237)
一、史馆修史与清代汉学、宋学	(237)
二、史馆修史与清代西学	(251)
结 语	(263)
附录：清代史馆所修史籍表	(273)
主要参考文献	(285)
后记（一）	(298)
后记（二）	(300)

绪 论

一、史馆释义

史馆，官署名，官修史书的机构^①。中国的史馆制度是从史官制度演变而来的。在传统史学发展中，史书编纂一般有两条途径，一为官修，一为私撰。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了较为完备的史官制度^②，自殷商到西周，史官在政治生活和学术生活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史官的执掌比较复杂，举凡占筮、记事、赐命、册命、典藏、预言、历法、祭祀、礼事以及临时差遣，等等，无不参与^③。而记载时事，编纂典册，一直是先秦史官重要的任务之一，为后人留下了可供考稽的著述。春秋战国之世，礼崩乐坏，学术下移，孔子首开私人撰史之风，编纂《春秋》，对后世影响巨大。及至西汉，司马迁撰作《史记》，更把私人修史推到一个高峰。但是，官修史书并没有因此而萎缩，相反，东汉以后，政府对于修史愈来愈重视，官修史书也不断走向繁荣。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初，便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史馆，从而开启了后世史馆修史的先河。

史馆的源头，一般都要追溯到汉代的兰台和东观，而实际上，汉代的兰台和东观与后世史馆的职掌有很大不同。兰台为“掌图籍秘书”之所^④，而东观则是

① 《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等辞书均有大致相同的解释。

② 关于先秦史官制度，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其所著《史通》一书中已有论述，并讨论了先秦至唐初史官的建置。20世纪前半期，探讨先秦史官制度的主要有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朱希祖、郑鹤声、金毓黻、刘节、卫聚贤、魏应麒、方壮猷、曹聚仁、黄云眉、劳干、柳诒徵、吕思勉、陈梦家、董作宾，等等，他们或在自己的著作中、或专门撰文讨论这一问题。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大量这方面的研究之作。目前有两部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著作可参看，一为席涵静著《周代史官研究》，台北福记文化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一为许兆昌著《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参阅席涵静著《周代史官研究》第四章《周代史官之职掌》，台北福记文化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

④ 《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

藏书之地，并非专供修史。但当时政府的一些修史活动却常常在此举行，如东汉先在兰台、后在东观征调官员组织修撰本朝国史《东观汉记》^①。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此地藏书丰富，便于修纂^②。三国两晋时期，主要实行著作官制度，即通过政府置官将撰修国史变成一项官方经常的固定的政治文化活动，专官专职，统一组织，并形成了专门的著作机构——著作局（或省），由著作郎、佐著作郎等组成著作官系统，负责国史等史书的修撰^③。而且，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还出现了监修国史，大臣崔浩就曾“监秘书事”，“综理史务”^④。北齐修撰国史，也设有大臣监修，名曰“监国史”^⑤。这些，都使两汉时期较为松散的官方修史活动变得日益严密，并向史馆制度迈进了一大步。

“史馆”一词，最早出现在《魏书》之中，《北齐书》、《周书》、《北史》也

^① 对于东汉兰台、东观的执掌及变化，参见牛润珍著《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8—56页。

^② 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84年版，第17—20页。

^③ 关于三国两晋著作官制的设立情况，参见牛润珍著《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

^④ 魏收：《魏书》卷35《崔浩传》。

^⑤ 《北齐书》中关于“监国史”的记载共有8处：卷18《高隆之传》记载高隆之“以本官录尚书事，领大宗正卿，监国史”；卷37《魏收传》记载魏收“（天保）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监国史”；卷38《赵彦深传》记载赵彦深“河清元年，进爵安乐公，累迁尚书左仆射，齐州大中正，监国史”；卷39《崔季舒传》记载崔季舒“除胶州刺史，迁侍中、开府，食新安、河阴二郡干。加左光禄大夫，待诏文林馆。监撰《御览》。加特进、监国史”；卷39《祖珽传》记载祖珽“拜尚书左仆射，监国史”；卷42《崔劼传》记载崔劼“转五兵尚书，监国史”；卷42《阳休之传》记载阳休之“天统初，征为光禄卿，监国史”；卷44《儒林传·张雕传》记载何洪珍“奏（张）雕监国史”。可见，大臣监修国史在北齐已经成为一种制度。

多次提到“史阁”和“史馆”^①，北齐时邢劭还有《酬魏收冬夜直史馆》一诗^②，说明至迟在北魏、北齐时人们已开始用“史馆”来称呼作为官方修史机构的著作局。另外，还有称“史局”和“史曹”者，说明此时著作局已纯为修史，具备类似唐代史馆的性质，只是尚未独立^③，直至唐贞观年间，史馆才真正成为独立修史机构，并对后世史馆制度产生重大影响。

唐武德年间，修史制度依然沿袭前代旧制，“因旧制，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置郎二人，佐郎四人”^④。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始将史馆独立出来，置于禁中，“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⑤。从此，史馆才由原来人们对著作局（或省）的称呼变成一个实体，并从秘书省中分离出来，取代了著作局的修史之职，成为独立修史机构。

唐代史馆有严密的组织形式，例有宰相监修，一般由史官与勤杂人员组成，

① 如《魏书》卷47《卢玄传》记卢元明云：“涉历群书，兼有文义，风采闲润，进退可观……天平中，监吏部郎中，副李谐使萧衍，南人称之。还，拜尚书右丞，转散骑常侍，监起居。积年在史馆，了不措意，又兼黄门郎、本州大中正。”《魏书》卷48《高允传》言：“初，（高）允所引刘模者，长乐信都人也。少时窃游河表，遂至河南，寻复潜归。颇涉经籍，微有注疏之用。允领秘书，典著作，选为校书郎。允修撰《国记》，与俱辑著。常令模持管箒，每日同人史阁，接膝对筵，属述时事。”《北齐书》卷44《刁柔传》言：“柔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志存偏党。”《周书》卷38《柳虬传》言：“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另外，《魏书》卷104《自序》及《北齐书》卷37《魏收传》均记载魏收“专在史阁”，这两篇文字原缺，系后人据《北史》卷56《魏收传》补入。《北齐书》卷8《后主纪》也提到“史阁”，此亦系据《北史》卷8《齐本纪·后主》补入。其他像《北史》卷26《刁雍传附刁柔传》、卷30《卢玄传》均提到“史馆”，《北史》卷64《柳虬传》均提到“史阁”。由于《北史》系李延寿在北朝诸史的基础上删节、补充而成，故而在史源上应以《魏书》、《北齐书》、《周书》的记载为最早。那些《魏书》、《北齐书》据《北史》补入的篇章，最初可能就是出自《魏书》、《北齐书》。

② 徐坚：《初学记》卷3《岁时部·冬第四》。

③ 《唐六典》卷9《史馆》云：“至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及佐郎，隶中书省，专掌国史。至晋惠帝元康二年，改隶秘书省，历宋、齐、梁、陈、后魏并置著作，隶秘书省，北齐因之，代亦谓之史馆。”北齐之后，“后周有著作上士、中士，掌国史，隶春官府。隋氏曰著作曹，掌国史，隶秘书省。”由此可见，北齐时期被人提到的史阁、史馆等，实际上就是负有修史之责的秘书省的下属机构著作局。牛润珍在《北齐史馆考》中认为北齐史馆是一独立修史机构（《南开学报》1995年第4期），岳纯之已辨其误，见岳纯之著《唐代官方史学研究》第二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另外，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到“史曹”，也是对著作局的称呼，见《史通·史官建置》。

④ 《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总序》。

⑤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另，此次移馆时间，《唐会要》卷65《秘书省》作“贞观二十三年”，误。赵冈《唐代史馆考》论之甚详，见《文化先锋》8卷4期，1948年5月。

在史官选任、史料收集等方面均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运作方式^①。自此以后，尽管官方修史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唐代史馆的影响一直存在。

宋代，史馆制度有了更大的发展，规模扩大。分置有史馆、国史院、实录院、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玉牒所、会要所等常设性和临时性修史机构。各种修史机构的设置、隶属、演变，极为复杂，且相互间关系密切，反映了宋代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②。同时，辽、金也仿效汉制，设国史院、记注院等修史机构，纂修本朝历史^③。元初，即置国史院，随后改置翰林兼国史院，并定国史院官制，设修撰、编修、检讨等多人。明代，因元之旧，其史馆隶属于翰林院，并分十馆，其人事管理虽较松散，但政治干预加强，应时修史，书毕馆撤，改变了唐宋以前相对独立的馆阁形式，出现了武臣监修的情况^④。到了清代，史馆制度更加完善，修史之馆种类极多，几乎覆盖了整个史学领域。有常开之馆，如国史馆、起居注馆等；有例开之馆，如实录馆、玉牒馆等；有特开之馆，如明史馆、三通馆、明纪纲目馆、通鉴辑览馆等；有阅时而开之馆，如会典馆、功臣馆等。其隶属关系也变得相当复杂^⑤。

以上，我们对史馆的发展做了简单的回顾。从这种回顾当中我们可以对史馆有一个较为全面地认识。

其一，史馆是由政府组织的修史机构，由皇帝信任的大臣担任兼修或总裁，由政府统一选任史官，参与修撰事宜，有一套与封建官僚体系相适应的运作方式。史馆是政治、制度、社会、学术、史学与文献的交汇点。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馆修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既完成了许多私人修史无法完成的宏大修史任

① 对于唐代史馆的运作方式，张荣芳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年版）以及岳纯之著《唐代官方史学研究》第二章《唐代官方修史机构——史馆》均有论述。

② 关于宋代史馆的设立、演变、执掌以及修史的各种情况，以下论著可以参看：金毓黻《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卷8期，1942年9月；许沛藻《宋代修史制度及其对史学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蔡崇榜著《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宋立民著《宋代史官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 关于辽、金修史制度的状况，可参见朱子方《辽朝史官考》，《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何宛英《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④ 关于明代史馆的详情，可参见商慧明《明代史馆考述》，《江淮论坛》1991年第1期；谢贵安《明代史馆探微》，《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⑤ 对于清代史馆的类型，有常开、例开、特开“三种类型”说和常开、例开、特开、阅时而开“四种类型”说。今从乔治忠的“四种类型”说，见乔治忠著《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务，又在控制修史、体现官方政治意志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二，史馆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随着时代和政治的需要，不断发生变革，但总的趋向是规模不断扩大，机制更加灵活，覆盖面越来越广，对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渗透越来越深。同时政府对史馆的控制也愈来愈严，史馆的政治化倾向愈来愈明显。

其三，从史馆确立的唐代开始，史馆和史官就有两大体系，一为修前代史体系，例以专职史官或他官充任，由宰相监修，史臣率皆各有本官，史毕馆撤，是一种临时性质的修史组织，唐前五代史就是这样修成的。二为列入政府常制机关的修史机构，即贞观三年自秘书省中移出之史馆，修撰国史、实录，为经常举行之事，是常制而富有弹性的修史组织，亦有宰相监修^①。唐以后，更形成了以国史馆、实录馆这些常设修史机构为基础，以其他各种临时性史馆相配合的修史体制，这是史学史发展的实际。尽管在不同的时代，史馆的概念有所不同，其内涵和外延也会有所变化，但常设与临时这两种形式却是一直存在的。

其四，中国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体裁多样，内容丰富，而且从未中断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国家任命史官、设立史馆、编纂史书、记述史事，使史学的延续与发展有了可靠的保障。可以说，设馆修史为后世之人留下了最基本的历史资料。

二、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及意义

有清一代，史馆修史兴旺发达，编纂活动持续不断，官修史籍种类繁多、部帙巨大，所取得的成就是以前任何王朝都难以与之比肩的。有鉴于此，本课题将清代史馆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此为枢纽，尽力考察清代史馆的演变，史馆的机制与运作，史馆与史官，史馆修史与幕府修书、私人撰史的关系，史馆与清代

^① 关于这一点，可参看雷家骥《唐前期国史官修体制的演变》，载《唐代研究论集》（第二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版。另，赵俊通过考辨，指出治史学史者通常认为唐前五代史为唐初史馆所修，实际是错误的。唐前五代史为秘书内省所修，史馆的任务是纂修国史和实录。这两种修史机构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临时性修史机构，后者是常设机构。其共同点是，都是官方修史，都有宰相监修。见《唐初修史机构辨》，《求索》1984年第6期。雷、赵二人结论大致相同，说明我国史馆制度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常设与临时相结合的运作体制。

政治、学术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等等，以此为关节点，揭示史学、政治、学术、社会之间的深层次的交互作用，并试图由此得出一些具有普遍理论意义的认识。

清代的史馆制度在前代基础上多所发展，表现出与前代极不同的特点。一是在史馆组建上呈现多元化。各修史之馆的隶属不同，有名义上属于内阁的，如实录馆；有属于军机处的，如方略馆；也有很多史馆并无严格所属。很多史馆是因政治、思想文化等形势的需要而临时设立的。二是史馆地位的多样化，各馆在政府中的地位有很大差别。三是史馆种类繁多，按其开馆的连续性来讲，就有常开之馆、例开之馆、特开之馆和阅时而开之馆等。各馆例有总裁、副总裁等职，形成了一套既灵活又严密的组织形式。四是史无专官，流动性大。但在史官任用上又有多种方法和途径。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在研究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这一问题时，不能不对研究对象划定一个范围，也就是首先对史馆有一个正确理解。从中国古代史馆发展史来看，史馆实际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史馆是指专门修撰国史、实录的机构，如唐代的史馆、宋代的史院^①、清代的国史馆等。广义的史馆则包括修撰起居注、玉牒、会典等，以及各种由政府统一组织、随时修撰史书的机构。它们在名义上虽各有所称，但所修均为史书或史料汇编，且与史馆一样，在修史组织、管理上有着大致相仿的模式。鉴于以上所列清代史馆制度的特性，笔者认为，对清代史馆，不能做狭义理解，不能自我局限于“史馆”一词之上，更不能将史馆仅仅理解为“国史馆”。仅仅研究狭义的史馆，不仅无法揭示清代官方史学的真实面目，而且不能发掘史馆制度因时而异的运作方式，更无法从根本上揭示史馆修史在王朝文治武功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笔者在研究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这一课题时，使用的是广义的史馆概念。当然，那些非纯为修史而设的编纂机构，如“四库馆”、“古今图书集成馆”等，不在我们的研究之列。

选择这样的课题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是专制制度渗透至史学领域的重要表现，自唐以降，一直在史籍编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史馆本身被纳入到整个官僚体系的运作之中，而史学在中国古代社会又备受统治者和史学家重

^① 宋代的史馆与史院制度相当复杂，其中变换更改，可参看蔡崇榜著《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宋立民著《宋代史官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视，因此，史馆就成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政治、文化相结合的基点。而且，史馆在发展变化中，每一时代均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有继承，有发展，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学术思潮、史学状况密切相关。抓住史馆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史馆修史的利弊，而且可以更准确地认识传统史学的本质与精神。

其二，清代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最后一个时代，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作用，又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跨越的时代。其在史学上，则表现出总结和嬗变的特点^①。其史馆修史，更是古代史馆发展的最后一个环节，无论是在史馆设立和官方史学的运作方式上，还是在官修史书编纂的内容以及史学与社会政治的结合上，都有不同于前代的特点。深入研究清代史馆的方方面面，不仅可以很清晰地揭示古代史馆修史的发展趋向，以及清代史馆在史学与政治之间所起的作用，而且还可由此考察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中史馆所扮演的角色，从而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其三，清代史学发达^②，尤其是官修史籍成就卓著。研究清代史馆，探讨清代史馆修史与幕府修书、私人撰史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史学思想的相互渗透或排斥，揭示史馆修史在整个清代史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可以使我们对清代史学的整体面貌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同时对于认识自唐以来中国史学的政治化趋向以及民间史学的抗争，也会有所裨益。

其四，探讨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这一问题，可以突破长期以来史学史研究中在史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泛泛而论的局面，深化人们对史学社会作用的认识。史馆是史学与政治结合的直接枢纽，仅就史官选任这一点而言，就可以看到现实政治对修史的作用，如党派斗争、民族矛盾等，导致史官结构的差异。至于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预以及适时开馆以配合现实需要，表现就更为明显。以往谈论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仅仅停留在理论认识的层面上，至于史学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政治又怎样使史学研究发生扭曲，史学与政治之间又保持了怎样

^① 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第八章，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对于清代史学的地位，陈寅恪先生认为“远不逮宋人”，“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史学“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见《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对此，杜维运进行过申辩，力主清代史学发达说，见《清代史学与史家》，中华书局1988年版。笔者同意杜氏观点，并在《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中作了进一步申说。

的张力，使之能够既相互牵制，又相对独立，不断维系下来，等等，尚无深入论说。本课题将史馆置于清代政治、社会、文化架构之中，通过深入剖析，试图真正将现实政治斗争和历史编纂问题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

其五，本课题选取史馆这一研究对象，还考虑到以史馆为基点，尝试做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通过这样的研究，试图进一步打破学科专史的局限，拓展史学史研究的领域。

三、清代史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20 世纪前半期的研究状况

20 世纪前半期，鲜有专门探讨清代史馆的论著，只是在研究其他问题时涉及史馆编修的一些情况。这主要表现在对清实录、清三通、起居注、清会典的研究上。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在 20 世纪 30 年代对清实录进行了研究，先后撰写了《读清实录商榷》^①、《清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②、《清世祖实录初纂本跋》^③ 等，对清实录编纂的时间、过程以及实录的篡改都有涉及。方甦生亦撰写《清太祖实录纂修考》^④、《清实录修改问题》^⑤。前文对清太祖实录的纂修和重修进行考证，并利用旧本《太祖实录》和改本《太祖实录》进行校勘，指出改本在内容上有诸多与旧本不同的内容，认为“旧本不失为清开国期比较质实的史料，虽有小疵，易于补正。改本却是瑜不掩瑕，无甚可取”。后文对孟森在《读清实录商榷》中提出的“改《实录》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实录的篡改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严重，“清实录非随时修改之书……乾隆以后，固未有重修实录事也”。王锺翰《清三通之研究》对清三通的编纂、体裁、取材、得失进行了研究，涉及三通馆的设立及三通编纂的情况，为进一步研究三通馆的

① 此文收入《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② 《图书季刊》新 2 卷第 1 期，1940 年 3 月。

③ 《图书季刊》新 2 卷第 1 期，1940 年 3 月。

④ 《辅仁学志》第 7 卷第 1、2 期合刊，1938 年 12 月。

⑤ 《辅仁学志》第 8 卷第 2 期，1939 年 12 月。

运作情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帮助^①。单士元《清代起居注》对清代起居注馆的设立及起居注的编纂进行了研究，指出“清代正式设立起居注馆始于康熙九年（1670），最早的一本起居注为康熙十年九月，记注官为折库纳”^②。柳诒徵《记光绪会典馆之组织》对光绪朝会典馆的设立、人员配置、编纂过程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资料丰富，为进一步认识清代会典编纂提供了帮助^③。另外，李晋华《〈明史〉纂修考》涉及明史馆设立及运作的情况^④。

（二）20 世纪后半期的研究状况

20 世纪后半期，关于清代史馆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除在官修史籍的研究中继续涉及史馆修史的情况外，还出现了专门探讨清代史馆的论著。

1. 对清代史馆类型及修史制度进行了介绍和初步分析

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⑤、沈原《清代宫廷的修书机构》^⑥介绍了清廷的修书各馆的类型。杨文介绍了清内府编刊书籍的过程，对武英殿修书处的机构、职掌、匠役情况及章程进行了研究，特别指出内府修书各馆大体分为常开、例开、特开三种。常开之馆有国史馆、方略馆等，例开之馆有实录馆、圣训馆、玉牒馆、律例馆、则例馆等，特开之馆有会典馆、三通馆、三礼馆、一统志馆、图书集成馆及四库全书馆等。认为武英殿修书处与修书各馆的关系是：“前者是刊刷、装潢书籍的出版发行机构；后者是书籍的编纂、修订单位，彼此关系密切。”沈文则将修书馆分为内廷和外朝两类，内廷常设的修书机构有书房、文馆、内三院、内翻书房、南书房、尚书房、方略馆、武英殿修书处等，外朝常设的修书机构有起居注馆、国史馆以及各种临时书馆。这里要特别提到乔治忠的研究，他在所著《清朝官方史学研究》一书的第一章《清朝的修史制度及其特点》中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对清朝官方修史活动的组织方式、清朝修史制度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清朝在史馆组建、人才任用方面，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体制，其

① 《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1938年12月。

② 此文收入作者文集《我在故宫七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 原载《学原》第1卷第9期，1947年，现收入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④ 李晋华：《〈明史〉纂修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排印本。

⑤ 清代官史研究会编：《清代官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